



阎晶明

记得去年七一前，中国作协组织去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内容十分丰富，教益颇多。大家都来自文艺界，自然十分关心相关展陈内容。其中有一专门的展区，是介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家边参观边讨论，这个关于文艺的“双百”方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因为正在读《毛泽东年谱》（下文简称《年谱》），对此有一点印象，就提到应该是1956年。但对此确实也不敢斩钉截铁。回来后又反复查阅《年谱》，认为自己所说大体符合事实。确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两层含义：既是毛泽东的想法、意见逐渐上升为党的方针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检验并逐渐确定为党的方针的过程。关于“双

百”方针，我们很容易说就是文艺方针，事实上，至少在一开始提出时，毛泽东的本意是将它确立为文艺与学术的方针。

在毛泽东那里，两个概念的单独、分别提出可能还可以更早好几年。合而为一讨论的，大体应该就在1956年。这一年的4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总结讲话中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这次会议比较集中、明确地讲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可见还是试探性、建议性的说法。1956年5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他在讲话中再次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道：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关于百花齐放，指出，“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关于百家争鸣，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学派，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首先，从总体上认为，确立这个方针“是有必要的”。同时或比喻或正式地讲明了“双百”的含义。从我阅读《年谱》的感受，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提出“双百”方针，除了希望文艺和学术繁荣，还基于他一直以来希望和倡导的党员干部要多学习、多掌握知识的观点。1956年1月以来，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干部以“老粗”为主不行，要尊重知识分子，甚至党员干部自己要努力变成知识分子。在此背景下，希望文艺和学术繁荣发展，并为广大群众喜欢和接受，希望党员干部带头学习文化，掌握知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已

经面对、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中甚至还为“百家争鸣”举了例子。他说：“一方面批评斯大林，一方面保护斯大林。斯大林是一种财产，有一部分错误的东西，应该批评。正确的部分应该保护，当做我们的一种武器，不要把这把刀子丢掉了，因为有用处嘛。”

一直到这一年的6月8日，毛泽东审阅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并同意发表。这篇长达1.5万字的文章发表在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开始就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由此可知，陆定一明确讲到“双百”方针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宣布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和科学的方针。这里，之前的“学术”置换成了范围更大的“科学”。同样是在1956年，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把“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决议当中。从此，一个在言谈中酝酿、在会议上讨论、在报纸上发表的概念，经由党的最高会议确定下来。当然，如果细读《年谱》，还会看到，此后很长时间，甚至一直到1959年，毛泽东都在一些场合就“双百”方针的适用性问题和一些人士进行探讨。

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时代发展如何翻天覆地，文艺与科学的变革如何日新月异，在当代中国，“双百”方针依然是党领导文艺和科学的方针。为其注入新内涵，使其发挥更加积极的指导性作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也有一些不能忘记的教训。梳理清由来、缘起，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深刻内涵。这当然不是这一篇小文章能说清楚的，如果能由此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则甚幸矣。

〔摘自2022年7月4日《人民政协报》，原标题为《“双百”方针的由来——〈毛泽东年谱〉里的文艺（之十五）》〕



陈赓在非凡的军旅生涯中，机智过人，诙谐幽默，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天才。

毛泽东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1922年秋天，陈赓在何叔衡的介绍下走进了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自修大学教室借用的是小学校舍，学生放学，青年们就来上课。学员们想从这里弄清中国的实际问题。陈赓走进教室，聆听毛泽东讲课。下课以后，陈赓跟毛泽东攀谈起来。毛泽东说道：“你跟铁路打交道（陈赓此前当过铁路工人），腿长嗓门大，将来应该是个‘火车头’……”

后来，陈赓到上海中共中央从事特科工作。在此期间，他在周恩来主办的《军事通讯》上看到了向全国苏区推荐的井冈山经验，了解到毛泽东创造的业绩。那时，陈赓就认为这是使中国革命积小胜为大胜的必由之路。长征开始后，陈赓被任命为直属军委指挥的干部团团长。由于该团人员作战经验多，装备较好，再加上陈赓的出色指挥，干部团不仅完成了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的任务，还多次配合主力兵团作战。毛泽东经常随干部团一起行动，并由此了解了陈赓的才能。遵义会议后，中央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24日，干部团先头部队占领了贵州土城。敌人穷追不舍，战斗在28日早晨打响。红军连续奋战三四个小时，战果未能扩大。毛泽东这时突然想到了陈赓，把手一挥，叫来了参谋，下令说：“叫陈赓带部队上去！配合3军团，一定要堵住敌人进攻！”很快，陈赓和宋任穷带领干部团飞奔向前线。

“4营重机枪掩护！1、2营上刺刀，准备冲锋！”陈赓喊了一声，斜着冲过土坡，倚在一块石头后面。4营的机关枪像风一般扫过前沿，反扑的敌军纷纷倒下……很快，在阵地前方，在敌人机关枪噔噔响的地方，升起了

几股夹着火焰的烟柱。

“炸得好！”陈赓欢喜地喊着。干部团冲击奏效，敌人决堤似的溃退。

当日下午2点多钟，跑步返回增援的红1军团第2师赶到了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连续反击。红3军团牢牢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

毛泽东站在山头上微笑，脸上漾起兴奋的神情：“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周恩来说：“我要亲自主持他的追悼会”

陈赓和周恩来是多年战友，两人信念一致，风雨同舟，战友情谊深厚。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周恩来在军校里担任政治部主任。就在这一年，已满21岁的陈赓来到广州，顺利地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生。

由于在军校里表现出色，1925年夏，陈赓成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当时，组织上批准邓颖超前往广州和周恩来完婚。因事务繁多，周恩来没办法前往码头迎接邓颖超。思来想去，周恩来决定把迎接邓颖超的工作交给陈赓。邓颖超来到广州的那天，周恩来把陈赓叫去，交代完注意事项之后交给他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并说：“待会儿你见到邓颖超同志之后，一定要好好向她说明一下情况。”

陈赓听完周恩来的交代后十分高兴，向周恩来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完成这个“特殊任务”。

不过，当陈赓来到码头后，码头上人来人往，无法找到照片上的邓颖

超。一直到码头上没有什么人了，陈赓还没有接到邓颖超，只好灰溜溜地从码头离开了。从码头出来后，心里着急的陈赓转念一想，邓颖超或许在找不到接应的人后，自己一个人前往黄埔军校去找周恩来了。想到这里，陈赓急忙向黄埔军校跑去。当他喘着气推开周恩来房间大门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子正坐在里面的椅子上休息，她正是照片上的邓颖超。

陈赓走上前与邓颖超握手致意，并向邓颖超反复解释。邓颖超却笑着对陈赓说：“麻烦陈赓同志来回跑一趟了，让你一个人在码头上等了这么久，我表示诚挚的歉意。”

在长征路上发生的一件事让周恩来难以忘怀。

1935年8月，周恩来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一起率领红军右路从毛尔盖出发，一路北上。在途中，周恩来患上重病。经随军的医生诊断，周恩来患上了可怕的肝脓肿。这个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很难痊愈的，甚至会危及生命，而且当时周恩来连续高烧不退。所有的红军将领都十分担心周恩来的身体。

一天，陈赓急匆匆地赶到彭德怀的住处，一上来就说道：“彭总，我有个请求，还请你务必答应！”彭德怀明白陈赓的心事，答应了他的请求。

陈赓来到周恩来的队伍后，上来就接替前面的战士抬周恩来的担架，周恩来此时因为连日高烧处于昏迷中。陈赓问患：“周副主席昏迷多久了？”在担架后面的萧劲光回答说：“有6个多小时了，我们都快急死了，但是现在部队缺医少药，实在没有好办法啊！”陈赓点点头没有说话。

此时红军队伍正在过草地。过了

一会儿，陈赓说道：“可惜现在不是在爬雪山，要不然就有办法帮助周副主席降温了！”杨立三说道：“前两天刚下过雪啊！但是草地上积雪融化得太快了！”杨立三的话算是提醒了陈赓，陈赓灵机一动说道：“大家看到前面的山丘了吗？我们将周副主席先抬到山丘的背阴处，说不定可以有好的办法！”众人听了陈赓的话，一鼓作气将周恩来抬到一处山丘的背阴处。陈赓看到地上没有融化的积雪，兴奋地说道：“太好了！有积雪！”随后陈赓将雪捏紧放在周恩来的额头、手掌心等地方，不到半个小时，周恩来果真醒了。他迷迷糊糊睁开眼，首先就看到了陈赓的笑脸。陈赓大声说道：“周副主席醒了！”周恩来很诧异地问道：“是陈赓啊！你怎么来了？”

萧劲光说道：“周副主席，陈赓主动向彭总申请过来给您抬担架，也是他找到雪帮您降温的！您现在好点了吗？”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不失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

看到周恩来能说话，陈赓笑了。周恩来说道：“谢谢你，陈赓！我好多了，不需要担架了，老让你们这么抬着我，也不是个办法啊！”陈赓一把按住准备起身的周恩来，说道：“您刚刚才好点，不能乱动，还需要静养。我们几个正好抬着您出汗，现在浑身暖和了！”周恩来明白陈赓这么说是为了让自己放心，但他知道陈赓的双腿本来就经常疼，不忍心一直让他抬着自己。然而陈赓一直坚持要抬，周恩来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了。陈赓等人将周恩来安全抬出草地后，急忙安排周恩来在一暖和的住处住下。毛泽东此

王守义，1898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西田果庄村。读完县立高小后，他在家乡小学担任教员，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改变了王守义的人生轨迹。他受新思潮启迪，辞去教师的工作，来到李石曾在保定布里村创办的留法工艺学校学习，为留学法国做准备。次年结业后，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和阻挠，只身前往上海，随第十五期留法勤工俭学团搭乘“波尔多斯”号邮轮远渡法国。

抵达法国后，王守义遇到不少困难。他的法文基础薄弱，文化水平低，要继续走“俭学”这条路十分艰难。好在他心灵手巧、踏实肯干，下煤矿挖煤、当洗衣工等都不在话下。也正是这段勤工生活，让他与当时在法的邓小平、聂荣臻等人建立起友谊。

王守义一边做苦工，一边学习了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从事汽车运输

王守义——以义行天下的旅法侨领

□ 王文欣

工作。他慷慨地将艰辛劳动所得收入用于资助中国同学深造成才，这样的义举让他在旅法华侨中获得美誉。受他资助的张德禄、王毓湖、程茂兰、王书堂等一批留法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机械、经济、天文等多个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

20世纪40年代，王守义在巴黎开了一家餐馆，取名“东方饭店”，为旅法同胞和乡朋友提供了许多方便。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他换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1971年，旅法华侨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成立了“旅法华侨俱乐部”。在华侨华人中颇有威望的王守义当选为常务委员、副主席。在此期间，他协助处理多起华侨遗产问题，维护了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他还在法国的图书馆发现了一批关于邓小平的资料，辗转通过大使馆送回国内。

王守义还对旅居巴黎的艺术家常玉、潘玉良多有照顾。1960年常玉意外身故后，热心的王守义帮助料理后事。他对孤身一人、生活拮据的潘玉良十分关照，多次鼎力协助地举办个人画展。潘玉良1977年9月病逝巴黎后，王守义主持了她的丧事，为她买地安葬，又出资租赁场地，将她的3000多件艺术作品保管起来，准备运送回中国。

1979年5月，邓小平出访法国，在机场见到了前来迎接的王守义，二人热情拥抱，互道别情。次年，邓颖超出访法国，几次邀他见面，敦请他归国定居。正当王守义开始办理回国手续，却发现自己身患恶性肿瘤。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托付好潘玉良遗作运回祖国一事，他于1981年5月5日在巴黎病逝。

（摘自202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张珍贵的党证

□ 李 伶

皮囊，别在腰带上，专置党证及用作党费的钱币。

1938年起，陈波历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参谋、参谋长、副团长。1940年底，太行山区反扫荡刚刚结束，黄崖洞兵工厂遭敌严重破坏，只能勉强生产一些质量不稳定的滚雷。如何用这些滚雷投入战斗，需要部队在试爆训练中积累经验。

1941年3月的一天，陈波为全团官兵示范滚雷的使用方法。在操作过程中，只听“嘣”的一声，滚雷一触即发。顷刻间，硝烟弥漫，陈波倒在血泊里。当剧烈的疼痛把他从昏迷中唤醒时，他已经躺在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台上。经过奋力抢救，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失去了一条胳膊。

手术后醒来，他用残留的右手摸到裤带上，发现少了什么，便焦急地问

道：“小皮囊呢？”护士将他的衣衣翻了个遍，终于找到那个火柴盒大小的小皮囊，从中掏出一张被鲜血浸染的党证。

无论是在艰难漫长的长征路上，还是在后来百团大战及辽沈、平津战役的战场上，这张党证一直被陈波贴身带着。它是陈波一心向党、历史见证，更是他坚定信念的生动写照。新中国成立后，陈波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及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摘自2022年7月10日《解放军报》）



多人，还顺带缴获了许多物资。后来，在长乐村公路上把敌人的辐重部队和撤退部队打得溃不成军，一共毙伤了2200多名日军。

1940年1月，陈赓来到太岳地区，建立了太岳军区。8月，百团大战爆发，陈赓带领部队在百团大战中表现非凡，多次出奇制胜。1942年10月，日军进攻太岳根据地，占领了沁源县和周边地带。陈赓立即召集了太岳各地的力量，把日军死死地包围在沁源城内。这场围困战一直坚持到了1945年，少量日军拼死逃出外，大量日军都被清除。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赓指挥志愿军第3兵团入朝参战。朝鲜战场上美军现代化的武器和战术带给了陈赓极大的震撼，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迫在眉睫。回国后，陈赓向中央军委提出申请并建议建设一所专门的军校用以培养军事技术人才。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后，陈赓从1952年开始，仅用1年多时间，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军事学院在哈尔滨正式建成挂牌。校内设立了多个重要的军事相关专业，着重于培养拥有现代化水准的优秀军事人才。后来，归国的钱学森在参观了军事工程学院后无比感叹地说道：“陈赓真是个人才，在当时我国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起这样一所拥有完整的结构且综合性丰富的军事技术学院，这放到世界上也是个不朽的奇迹。”

就是这样一个戎马一生的人，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这一天是1961年3月16日。

（摘自《党史博览》2022年第9期，原标题为《虎将福将陈赓》）

